

## 一、緣起

任教於美國紐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的女兒景欣，今年年初利用教師任教假期（每教課三年，即可休假一學期），帶著一兒一女到日本上學半年，以接受不同於美國國境的東亞語言文化。

為了和女兒一家人聚會，七月中旬，筆者與外子濟寬、小兒毓山等家人一齊搭飛機往日本東京，在成田機場下機入境，搭火車至高田馬場站，出站後住進 VESSEL Inn HOTEL，並與女兒景欣、孫女亮和 Clarity、孫子為理 Kenning 等共進晚餐。

次日起數日之間，筆者與景欣等一家人一齊遊覽當地風光，首先觀賞了日光東照宮、寶物殿、輪王寺等江戶時代的重要名所之後，再赴日光江戶村參觀江戶村風光、看表演、遊「地獄寺」、逛街、看影片。也逛了 Tokyo Midtown（複合商場），並赴 Suntory Museum of Art 看「吵吵嚷嚷的日本美術（まだまだざわつく日本美術）」特展，欣賞了陶瓷、屏風、繪卷、漆器、織品等日本藝術品。

至 7 月 15 當日，早上便赴靜嘉堂文庫美術館，看「繪畫入門：簡明易懂的神佛、人物解密」特展。下午即進入東京國立博物館。

## 二、收藏東洋千年古物的博物館

東京國立博物館，是日本國內最大的博物館，位於東京都台東區上野公園北端，明治 5 年（1872 年）時，文部省博物館假幕府德川家族於江戶時代元祿 3 年（1690 年）修建的湯島聖堂大成殿，舉辦日本國內首次博覽會，遂將此年列為博物館的創立年。正式設館是在 1881 年，於上野公園寬永寺舊址建成 2 層紅磚造之陳列展館，開啟了東京博物館從事收藏、展示、研究等運作活動的端緒，後毀於關東大地震。



圖1：東京國立博物館主館

現在的博物館完成於昭和13年（1938年），由一幢日本民族式雙層樓房、左側的東洋館、右側的表慶館，以及平成館、法隆寺寶物館等5棟建築物結構而成。館內總共具

有43間展覽廳，陳列面積1.4萬餘平方公尺，內收藏了11萬件相關日本的歷史文物與美術珍品，其中國寶87件，重要文物634件，以及一些受委託保管的文物（圖1）

此博物館群館中，位於左側的東洋館，又稱亞洲館，收藏陳列著中國古代佛教藝術品，數量豐富，其中所展示的「七寶台石雕佛碑像」等，屬於唐代佛教雕刻品，已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，十分珍貴希有。日本對古物的等級，分國寶、重要文化財、重要美術品三級。而若經鑑定屬於國寶級、重要文化財級的文物，則不准出離日本國境。

此東洋館的第一層展覽廳，所陳列展示品中，有15件來自西安寶慶寺的唐代佛像雕碑，亦即七寶台玉石雕刻佛碑像，雕碑均呈長方形碑刻造型，每一件碑刻均高1公尺以上，內刻3尊佛菩薩像、15件石雕碑刻，依展覽廳的右側牆面中端橫列一排，加以展示，十分醒目。另外，此展覽廳的中心位置，豎立著數尊高大的佛菩薩雕像，其中一件比人還高的石刻菩薩立像，亦為高浮雕框形的十一面觀音菩薩像，和七寶台玉石雕刻佛碑像同為唐代珍貴作品，且均屬武則天在位時期所創作的文物（圖2）。

以下為追溯這些玉石佛雕碑文物的歷史源流，亦即探討源自西安寶慶寺塔所鑲嵌的唐代佛雕，首先回顧一下原始雕碑文物的創意者武則天的生平履歷。



圖2：東洋館展場內觀

### 三、武則天創光宅寺建七寶台

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正統的女皇帝，其生平信仰佛教，處於初唐之際，進入皇室，掌握從政治國方針，所建立的唐代國勢，業績可觀。

武則天(624~705)本名無記載，乳名華姑，稱帝後，以自創文字「曷」為名，故稱武曷。為荊州武都督次女，自幼受到母親楊氏的教化影響，經常赴寺院參拜，接觸佛教文化，虔誠信仰佛教。14歲時入唐後宮，為唐太宗才人，獲賜號「武媚」。至唐高宗時，初受封為昭儀，後升為皇后，早先曾一度削髮為尼，其後獲得唐高宗的信任提拔後，重返宮中，再次成為高宗的皇后，且與高宗共同執政，並「二聖」。高宗歿後，獨自掌握政權，更改國號為周，一般稱為武周，是正式的女皇帝。

武周當政時期大力推廣佛教，曾下令修建寺廟與佛塔，為數可觀。又曾捐資兩萬貫胭脂錢，以開鑿龍門石窟奉先寺洞雕刻盧舍那佛主尊大像及左右八尊群像(圖3)。也鼓勵僧侶研讀佛經、翻譯佛經，並親自參與譯經工作，其弘揚佛教理念用心至鉅。

武周時期所建造佛教造像，除了洛陽龍門石窟之外，其他以西安七寶台諸像較具代表性。武則天於儀鳳二年(677年)，在長安創立光宅寺，或謂篤信佛法的唐高宗，因光宅坊葡萄園內出土舍利萬枚而敕建，成為西京名剎。而光宅寺內建造了高百尺的寶閣，稱七寶台，其閣台壁面鑲嵌飾有高浮雕佛像30餘石。其後光宅寺廢棄，寺內所飾浮雕石佛碑像移置於寶慶寺塔內。

今日西安南門附近，尚殘存一座寶慶寺磚塔(圖4)。寶慶寺初建於隋文帝仁壽年間(約601~604年)，磚塔建於唐文宗朝(827~840年)。唐文宗因以五色磚在寺內造作塔，故寶慶寺亦名華塔寺，或花塔寺，此花塔為六角七層，高23公尺，第一層塔簷下有龍鳳雕為飾。但此寶慶寺在五代時期殿宇毀於兵火，



圖3：龍門石窟奉先寺洞盧舍那佛

惟塔尚存。至明代景泰二年（1451年）移塔建寺於今址，清末至民國年間，寺院再次被毀，惟塔仍然幸存。

現今所見磚塔，塔身為明代重建。但七層塔面原鑲嵌有北朝和隋唐的石雕佛造像，其中第二層所鑲嵌者，即是武則天於長安三年（703年），由鎮國大將軍、左監衛門大將軍、上柱國梁義深等所建造的七寶台白玉石雕佛像。

武則天晚年，在長安光宅寺所建造的這座七寶台，其台上鑲有許多精美的石雕佛碑像。這些佛碑像後來隨寺院遷移到了寶慶寺，包括十一面觀音立像佛龕及阿彌陀如來、彌勒如來等為中尊的三尊樣式佛龕，共計 32 件。



圖4：西安寶慶寺磚塔

#### 四、千年後的七寶台玉石佛雕碑被運離原創故鄉

這批七寶台佛雕碑等，歷經千年之後，至清代雍正元年（1723）寶慶寺重修時，將唐代石佛浮雕碑像部分嵌入塔壁，部分嵌入佛殿壁。

其後這批石佛高浮雕碑像於清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之際，被日本人早崎梗吉發現，並加以收購。在數年之間，寶慶寺佛殿寺塔壁上的石佛浮雕碑像全然消逝。應是大部分被早崎氏購去，運抵日本，共 19 件石雕，其中有部分流向美國波士頓弗瑞爾美術館。

另一說：後因種種原因，這批造像陸續流失，現多件藏於海外：日本計有 21 件，其中 15 件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，另外，中國存 7 件，4 件流散在美國。

此日人早崎梗吉氏曾任東京美術學校校長岡倉天心的助手，岡倉氏用心於佛教藝術史跡的研究，曾多次赴中國、印度等地考察。1893 年來到西安寶慶寺，發現石刻碑像是一千年前的唐代文物，於是駐紮西安一段時期，授意早崎氏收購之，運回日本。這批玉石佛雕再經幾度轉則之後，至今已成為東京國立博物館典藏品。

總計這批唐代佛教石雕碑像，大部分被移運離開創作的故鄉，進駐日本以及美國，至今已逾 130 年。

以下再探討七寶台玉石佛雕像碑等所呈現的唐式風格。

## 五、七寶台玉石佛雕碑等所呈現的唐式風格

原七寶台玉石佛雕碑像群，每一座石雕多為1公尺以上高度的高浮雕，內中不少遺留有功德主名紀年刻銘者，而以長安年款（701~704年）者居多。此足以判定是八世紀初年即初唐時期所製作，也可反映武周時期藝術風格的特色。

此展示於東京博物館東洋館的七寶台浮雕石佛碑像，呈長方塊型，高度約為105公分至110公分之間，寬度約為高度的3分之2左右。深度為15~26公分。每座碑像正面可分上、中、下三部分。上端與下端較平刻，中端部分則向內凹刻，以三尊佛像，或一佛二菩薩像為主軸，而呈一佛二菩薩像者居多。三尊佛像，應為釋迦世尊、彌陀、彌勒；一佛二菩薩則主尊或為阿彌陀佛、或為釋迦世尊、或彌勒佛等，兩旁再加二脇侍菩薩。

三尊像均以坐姿佛尊為中央主尊，佛尊法像頭頂為螺狀髮紋，髮螺正中挺起形成髮髻。法相顏面天庭寬廣，兩大耳修長貼臙邊，面頰豐滿，兩眼垂瞼，五官端莊，呈現漢人面相。頸部有三道項線，衣薄貼體，所穿衣袍表現的多為唐式覆蓋左右的通肩袍服式樣。

主尊佛多以結跏趺坐之姿坐於寬廣的蓮花寶座上，以釋迦牟尼世尊或阿彌陀佛為主尊者，如高延貴造阿彌陀佛三尊像碑（圖5）。亦有兩腿垂在座前，形成善跏坐之姿，如姚元景造彌勒佛三尊像（圖6），此以主尊為彌勒佛者，其數量較少。至於其雙手之姿，多以左手禪定印置於腹前足上，右手則或上舉作施無畏印、或作說法印、或下垂置於右膝前作觸地印，以表示降魔之意。

而主尊佛所坐蓮花寶座亦具各式造型，或仰蓮瓣與俯蓮瓣相疊，或二、



圖5：高延貴造阿彌陀佛三尊像玉石浮雕碑

三層仰蓮瓣重疊，或是蓮花座架在方形墊高的石座之上，形成須彌座，如如來佛三尊像（圖7）。

主尊坐佛兩旁多為立姿菩薩，菩薩像則髮髻高聳，頸下胸前裸露，披掛瓔珞飾物垂及前胸，腰下則繫裙裳，覆蓋至兩膝腿之下。左右雙臂之姿則或一下垂持瓶一上舉持柳枝，如李承嗣造阿彌陀佛尊像碑（圖8），其他碑像或持其他法器，而身軀體態略呈S形彎曲，有婉約動人的意態。

由於兩尊立姿菩薩像，站立於主尊佛左右兩側，形成二脅侍菩薩，其手印姿勢遂形成左右對稱之姿，表現了協調、亦靜亦動的美感。

佛菩薩法像背後所刻圓光，其上端尖突，呈現蓮花瓣造型，菩薩雙足下則踩踏著盛開的蓮花花托，表現了清淨莊嚴的氣勢。



圖6：姚元景造彌勒佛三尊像

每座石雕碑像的上端均安置了華麗的寶蓋，亦稱華蓋，而多數的寶蓋部分以橫線分隔尊像頂。整座寶蓋以線刻寶珠垂飾為圖像主軸，左右兩側配以伎樂天人像，頭面放低，兩腿向後上舉，姿勢十分生動。

寶蓋圖案造型，每座碑像表現不一，各具特色。一般以平面凹線細刻紋表現者居多，如韋均造阿彌陀佛三尊（圖9）。但亦有特殊造型者，如如來佛三尊像碑，石碑寬度較寬，主尊佛頂上不以橫線刻華蓋，而以弧形傘狀造型，刻在主尊佛頂上。而在厚厚的高度上，再以細線刻畫圖案。而此弧型傘蓋左右兩側，再以立體浮雕的方式，刻出了兩具伎樂天人，頭部及雙手向下，身軀及雙腿仰上，呈跳躍、舞蹈之姿，表現了十足動感之美。（見圖7）

石雕碑像的下端，或浮雕立體供養花朵器物，或留款供養人名諱，兩旁浮雕立體供養天人。多數碑像下端呈淡雅線刻，以襯托出上端主尊高浮雕佛

菩薩像的華麗莊嚴。而圖 B 的石佛碑像，在以世尊為主尊的一佛二菩薩像的下端，安置了平台，平台之上，安置三座蓮花寶座，而主尊寶座兩側，與脅侍寶座之間，亦浮雕了兩位供養小天人，十分細緻精巧。

平台的下端，非全面平版細線刻，而是在左右兩側，以淺凹的形式，呈現兩位供養人。側面半跪座之姿，雙手合舉於胸前，或持著花朵供物，對著中央，加以禮敬，以示虔誠供養。如前述高延貴、李承嗣造阿彌陀佛尊像碑，其下端左右各凹刻了跪坐的供養人，十分虔敬。（見圖 5、8）。

歸納此七寶台石佛雕碑群像中央主尊佛的特徵：

一者，佛尊面相端莊飽滿，頭部為螺髮或水波形髮，髮髻高高挺起，是繼承隋代的基礎式樣，但超越了隋代，表現了高度智慧與慈悲的神韻。

二者，佛尊身軀比例勻稱，結構合理，胸肌起伏，體態豐滿，腰肢挺直，是定力的象徵。

三者，佛身穿薄而貼身衣紋，或呈偏袒右肩式，或雙領下垂式，有承襲印度笈多時期秣菟羅風格的特徵。

四者，以釋迦世尊為主尊坐姿，其兩腿結跏趺坐，現世尊禪定相、降魔像、說法相等。若以彌勒佛為主尊者，則兩腿不結跏趺坐，兩腿下垂寶座前，呈現倚坐造型。



圖7：如來佛三尊像



圖8：李承嗣造阿彌陀佛尊像碑

五者，七寶台石雕佛像碑確立了唐代佛尊主像的圓融風格。

## 六、唐代長安在佛教史及世界文化史的地位

若以世界宗教史的角度視之，世界上自古流布著三大跨國際性的宗教，即佛教、基督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。其中以佛教誕生最早，流布的時間最長，自前 5、6 世紀至今，距今已接近 2 千 6 百年，（佛陀世尊誕生於 565BC）。原身分為迦毗羅衛城（古代印度城邦之一）的城主之子，姓喬達摩，名悉達多，卻經歷了出家、苦行、降魔而成正等覺，再進入說法度眾的階段。世尊在印度的創教，改寫了印度婆羅門教文化，佛教傳入中土後，也創造了中土人文宗教新世界。

若以世界文化的角度視之，印度在 5 世紀的笈多王朝，創建了文治武功高度成果的政局，版圖遼闊，四夷來朝，且被認定當時印度是全世界文化的中心。

而到了 7 世紀，由於佛教北傳，傳入中亞，再由玉門關沿著河西走廊絲路，進入中土長安，經歷南北朝隋唐帝王的弘揚，寺院林立，高僧四處說法。全世界最精華的物質與精神思惟，均聚焦於長安，故 7 至 8 世紀的長安，被譽為全球文化的重心。

長安在當時既是全球文化重心，則所刻七寶台石佛碑像，在法義上必具佛法的精神思惟。而佛法的總綱，自三藏十二部浩如煙瀚的經文裡歸結之，以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為主軸。此戒、定、慧即是佛法的精神思惟。



圖9：韋均造阿彌陀佛三尊像

原七寶台的石雕佛碑像的中央主尊像，其法相五官，由其雙眼垂瞼下視、雙脣緊閉的神情上，呈現「戒」的意涵。其次，佛碑像主尊的坐姿，以雙腿結跏趺坐，足心朝上，腰背挺直，是十分穩定的坐姿，故呈現了「定」的意涵。再者，佛碑像主尊的頭頂肉髻高突，兩眉中心現毫毛，腦後現頭光，肩後現身光等，這些圖像都是智慧的象徵，故是呈現了「慧」的意涵。

總結之，七寶台的石雕佛碑像，展現了戒、定、慧，佛法的精神思惟。

唐代開國始祖高祖於即位時，即設十大德官位以統攝僧尼。唐太宗時，下詔在全國「交兵之處」建立寺剎。當玄奘西行求法歸國後，於慈恩寺組織大譯場，大事翻譯佛經，因之，創立了唯識法相宗。武則天更因崇信佛法，即位後，推動一連串的佛教措施，開拓沙門的封爵賜紫，僧尼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。另又組織佛經譯場，開鑿石窟，禮遇神秀大師，助禪宗大盛。又詔令繼前朝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六十卷後，重新啟動翻譯能手，正式完成了《八十華嚴》的譯本，直接促成賢首法藏創立華嚴宗。

就中國佛教各派系發展史而言，自漢晉之際自印度傳入中土，逐漸形成宗派，南北朝時代，已有六派傳承，至7、8世紀的唐代，更達十宗並弘的景象。此十宗分別為：俱舍、成實、律、淨土、三論、天台、法相、華嚴、禪、密等。

此十大宗派，雖分布南北各地，但佛教哲學思惟則是一式的，每一座寺院所供奉的佛菩薩尊像，其姿勢服飾取向也應是差別不大的。

唐代前期佛教興盛，佛寺道場千萬，相對的所供尊像也必然達相當可觀的數量。然而至唐武宗會昌年間，皇帝下詔毀佛，壯闊的寺院道場及所供奉



圖10：阿彌陀佛坐像，現藏於中國山西省博物館

尊像，也因之被摧毀一空，能遺留儲存至今者，十分稀有，何等珍貴！

七寶台石雕佛像碑既創作於 8 世紀初年的武周時期，是沿續隋代風格，然較隋代雕像更加圓融，可目之為「初唐風格」的主軸代表作品。

至於繼初唐的盛唐作品，則遍布全國寺院、南北石窟，數量極多，不可勝數，一般以山西太原天龍山石雕造像為石窟代表。至於寺院佛像，則以供於山西



圖11：佛光寺東大殿主尊「釋迦坐像」

五台山佛光寺、南禪寺等大殿內的佛菩薩像為具歷史性。例如，現藏於山西省博物館的一尊「阿彌陀佛坐像」，具「大唐開元十四年」銘文，是創作於 728 年(圖 10)；而佛光寺東大殿主尊「釋迦坐像」造於唐天寶 11 年(752 年)(圖 11)。此二尊 8 世紀中葉的雕像，均頂上螺髮粗大，五官容顏豐滿，兩肩寬闊，胸部肌肉突出；均是繼初唐風格為基礎，而發展出盛唐佛教造像風格的表徵。

是故，今日在東京國立博物館，尚能見到千年前所造如此完整、莊嚴、充滿唐風的七寶台玉石雕刻佛碑像，是何等希有的緣分！而從這些佛碑雕像的法相神韻、法體姿勢、上下手印、袍服造型等，讓我們既可領略佛法深奧圓融的哲理，又能欣賞大唐寬廣、精巧、超然妙趣的佛藝境界，真是回味無可窮盡的！🌀